

全面解读 一生不容错过的古典名著

·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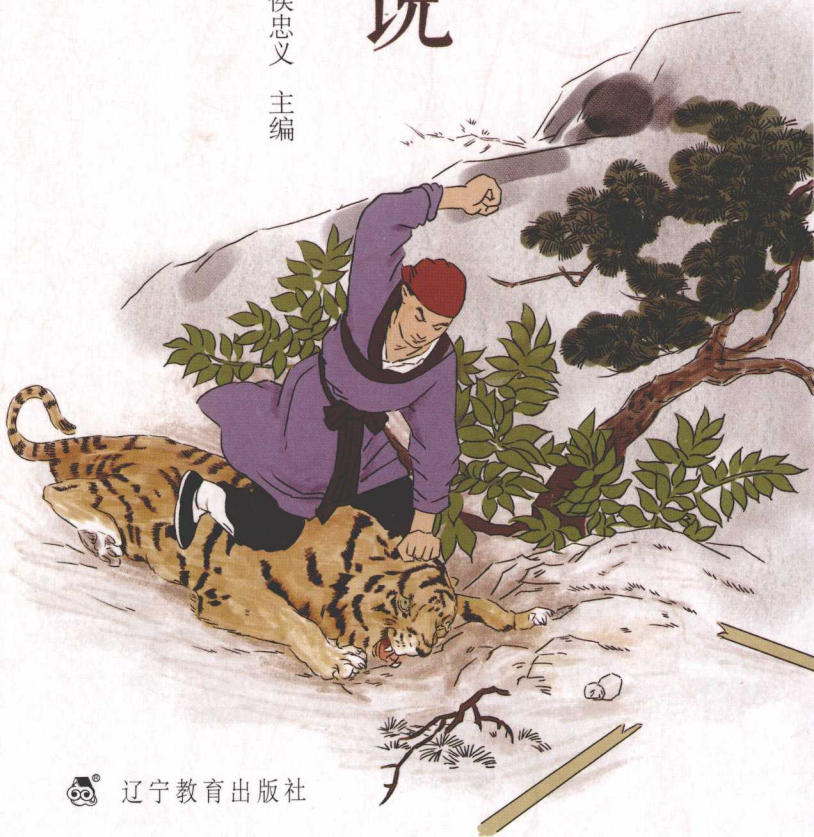
侠义公案

上
小说

侯忠义
主编

解读

《水滸传》
《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全面解读 一生不容错过的

013034561

I207.41

68

V2-1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侠义公案 小说

上

解读



侯忠义 主编

《水浒传》
《三侠五义》
《儿女英雄传》



北航

C1642194



辽宁教育出版社

I207.41 68 V2-1

013034281

©侯忠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侠义公案小说. 上 / 侯忠义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2-9963-2

I. ①名… II. ①侯… III. ①侠义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46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 207 千字 印张: 12.25

印数: 1—5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唐日松 严中联

责任校对: 金玉华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瑞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9963-2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解读《水浒传》	1
一 丰碑一座文气凌千古——代奇书《水浒传》	2
二 神州何处觅踪影? ——《水浒传》作者之谜	35
三 瓦舍勾栏唱彻忠义魂 ——水浒题材的史实依据及故事的流传演变	38
四 青史万年播俊豪——梁山五大英雄解读	44
五 刀笔书剑续新篇——《水浒传》的后续著作	61
解读《儿女英雄传》	77
一 “自承与《红楼梦》争胜” ——《儿女英雄传》的历史地位	78
二 八旗宦家——《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	80
三 “世情”杰作——《儿女英雄传》	88
四 艺术采珠——《儿女英雄传》的艺术成就	109
五 白璧微疵——《儿女英雄传》的不足	124
解读《三侠五义》	129
一 侠义公案两相益 ——《三侠五义》是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	130
二 清代说书第一人——《三侠五义》的作者石玉昆	133

侠义公案小说(上)

三	妙笔润色成佳章——《三侠五义》等书的由来	134
四	拨开云雾见真情——《三侠五义》中的审案故事	136
五	忠君贤臣传古今——《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	146
六	除暴安良显诚意——《三侠五义》中的侠义故事	154
七	名缰利索总牵心——《三侠五义》中的展昭形象	166
八	平话的风格,杰出的艺术 ——《三侠五义》的艺术特色	170
九	《续侠义传》《小五义》与《续小五义》 ——《三侠五义》的续书	175

一 丰碑一座义气凌千古——一代奇书《水浒传》

(一) 《水浒传》唱了一支什么样的歌？

《水浒传》唱了一支什么样的歌？是忠奸斗争的悲歌？农民革命的颂歌？市井细民的心歌？还是混声合唱的英雄交响乐歌？不管人们给这支歌下什么样的定义，它那声震霄汉、昂扬激荡的美妙旋律，都使古往今来无数读者为之心醉神迷、折服倾倒。明代散文家袁宏道就曾记录下一个十分生动的事例：

一位好读书的秀才缄默了十年。有一天，他忽然拍案狂叫起来：“异哉，卓吾老子吾师！”听者大吃一惊，连忙发问，他回答：“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传》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东西汉通俗演义序》）

这位被圣贤之书折磨得头脑昏沉、精气枯竭的儒生，借助于李卓吾批点的指引，在《水浒传》美妙乐声的震颤下，竟然使封闭十年的心海，一下子奇迹般地动荡豁然了起来。那么，使这位读书人如此痴狂的李卓吾所揭出的“一段精神”又是什么呢？

明、清两代众多的《水浒传》批评家中，有两位大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位就是被封建文坛视为异端之尤的明代卓越思想家李贽（字宏甫，号卓吾），他开创性地高度评价了《水浒传》。针对封建卫道者“海盗”“倡乱”的恶声诬骂，李贽以反传统的超凡识见和勇气，突出强调了《水浒传》“忠义”的思想内容。他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愤慨于宋朝“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颠倒混乱的时政。因此梁山义士不是造反的强盗，而是被驱逼的“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们“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忠义水浒传序》）。

李贽在这里已经指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的这一思想倾向。不过，他把“逼”和“被逼”双方的矛盾，仅仅归结为“贤”与“不肖”的冲突，是忠于君国、有才有识的热血义士与欺君罔民、妒贤忌能、贻祸国家的奸佞肖小的斗争。所以，他把蓄意招安、至死不忘效忠君王的宋江，奉为“忠义”的最高典范。

《水浒传》谱写的是一曲“忠奸”斗争的悲歌。李贽的评点“无恶不归朝

廷，无美不归绿林”，批判的锋芒无情地指向了封建专制礼法和贪酷官僚政治，把同情与赞美毫无保留地给予了受迫害的反抗英雄，对广大读者冲破封建正统文坛的思想藩篱，正确认识、理解《水浒传》的思想和艺术，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但是，尽管李贽是一位杰出的反礼法斗士，他对《水浒传》的认识也只能达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高度，无法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很显然，他赞颂《水浒传》的“忠义”主题，立脚点是忠于君义于友，报效朝廷。封建伦理观念和正统皇权思想的束缚，影响了李贽对《水浒传》思想价值的更为全面科学的发掘和把握。

继李贽之后，《水浒传》评论史上的另一位大家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以卓异颖敏的识见和鉴赏力，对《水浒传》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深入的评点。他对《水浒传》文学创造上的成就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传》右者；天下之格物（指作者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深入接触、研究而获得对事物深刻认识的一种方法）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为此，他把一部《水浒传》授给年刚十岁的儿子，作为日后打开经史文库的一把钥匙来阅读：“《水浒传》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水浒传序三》）

然而，他却是最竭尽全力反对李卓吾“忠义”说的一个。他认为《水浒传》中的英雄都是“揭竿斩木之贼”，如果冠以“忠义”美名，那么就要产生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水浒传序二》）的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严重恶果。当然，他们也就不配享有受招安的待遇。于是，他对《忠义水浒传》的原本进行删削批改，砍掉七十回后的招安等全部内容，添上了卢俊义做噩梦，梦见一百单八将全部被杀的结尾，制作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可是金圣叹批改后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却并没有因他要竭力删除“忠义”精神而使梁山义士贼面可憎，反倒使原本《水浒传》的民主性精华更加突出，抗争性、鼓动性更为强烈。更由于他批改后语言文字益趋精粹、情节结构更为洗练紧凑、人物性格愈加鲜明统一，而使《水浒传》的传播出现了空前的盛况：“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编。”（清·梁章钜《归田锁记》）

怎样解释金圣叹评批《水浒传》所出现的这种奇怪的现象呢？问题的答案存在于金圣叹社会政治观复杂多元的矛盾之中。金圣叹绝不可能改变维护封建君权统治的地主阶级根本立场，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给“盗贼”戴上“忠义”的桂冠。他认为“盗贼”与朝廷是对立的两极，忠义只能在朝廷而不

能在水浒，否则就是“名实抵牾，是非乖错”（《水浒传序二》），破坏了“杀人者死，造反者族”的封建大法，使朝廷“从此无治天下之术”（《宋史目批语》），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扮演封建卫道者角色的昏庸的金圣叹。

然而，事物还有另外的一面。清寒的门第，放荡不羁的个性，再加上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等人文主义新思潮的浸润，诸种元素化合发酵的结果，就使得金圣叹这位地主阶级文人在竭力鼓吹君权神圣、维护封建伦理核心“忠义”观的纯洁的同时，清醒地看到了封建统治危机的社会根源——腐败的吏治是迫使受害良民挺身为盗的罪恶渊藪。他说：

“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

强盗不是天生的，是由于父兄失教、饥寒驱迫所致，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子，则在于天子没有尽到“养民、爱民、教民”的职责，在于只知盘剥良民、“俨然为盗”的各级赃官昏吏。（均见《宋史纲批语》）

现在，闪耀在我们眼前的则是金圣叹思想情感中，批判黑暗统治、同情人民反抗的一束叛逆之光。正是这种有悖于封建正统伦理观的“异端”言行，使金圣叹在他所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中，揭示出了“乱自上作”“被官所逼”（第一回批语）的水浒英雄造反的社会政治根源，对梁山义军惩处贪官污吏、抗击劣绅恶霸的正义行动，以及好汉们见义勇为、同生共死的豪侠品性，予以热烈赞扬、深情叹美。而他为维护纯洁“忠义”观对《水浒传》招安内容所进行的删砍，客观上减弱了原作所宣扬的忠君思想，使梁山的“聚义”本质得到突现。由此看来，金圣叹通过批改评点，着重强调的是《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义侠颂的英雄旋律。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精辟分析、独特见解，为人们认识理解《水浒传》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和李贽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也不可能对《水浒传》的思想主题、社会意义做出全面正确的总结。

与李贽、金圣叹不同，我们认为《水浒传》所描写的“逼上梁山”的斗争，反映的是发生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期的一场农民武装起义。通过对这场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完整叙写，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腐朽，颂扬了受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无畏英勇。

(二) 《水浒传》的主导思想

尽管《水浒传》的内容繁富复杂，有着众多的人物、曲折的故事、纷纭的细节、交叉的头绪，但“官逼民反”却是作者纵横铺展、结构全书的中心轴线，提炼情节、刻画人物的主导思想。请看一百回《水浒传》所提供给我们的形象描绘的实际：

魔殿为何“遇洪而开”？

梁山聚义的正文是从第二回开始的。然而，作者为什么要虚构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作为百万字大书的开篇第一回呢？此中深意，细心的读者是不应忽略的。

撇开这一回中所描绘的道教天师禳灾消祸等宗教迷信内容和曲意渲染的蛇虎试探、黑气滚动等神秘色彩，这一回中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就是殿前太尉洪信了。此人怎么样？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具有那救济万民的“一点志诚之心”？

我们看，他才走了数个山头，二三里路，刚有点儿腿脚酸软，便心中犯起了嘀咕：“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裯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哪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这个锦衣玉食惯了的朝廷贵官，上山路上出尽了丑态洋相，而一旦到了权势所及时，却又骄横跋扈，判若两人。对违背他旨意的道士，他构陷“煽惑军民百姓”的罪名，“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真是不假思索，轻易拈出。难怪金圣叹作了这样的夹批：“看他随口谄出人罪案来，前后太尉一辙也。”不错，这个洪太尉与正文中的泼皮高俅正是一对孪生兄弟。

洪太尉所做的唯一一件要事，就是打开了“伏魔之殿”，导致镇锁在万丈地穴中的一百单八个魔君冲天出世，使赵宋王朝“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这里有两个问题耐人寻味：一是魔殿中石碑上有四个正楷大字“遇洪而开”。如此奇巧，难道真像作者所说的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

所谓“天数”反映了作者唯心主义的宿命思想，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剥去这一层神秘的表衣，小说所要揭示的应是这样的一层意思，即一百单八个魔君的出世，完全是由上层统治者一手造成，也就是金圣叹所批示的“乱由

上作”之意。因为社会斗争的规律表明，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迫害，总是要制造出无数反抗他们的“魔君”，而“魔君”虽遭镇压，却永远是镇而不服，一有时机就要冲天而起，所以“遇洪而开”看似偶然，实质上是历史的辩证规律在起作用，寓含着必然的因素。

那么，为什么要让洪信来担承起放走魔君的责任呢？这里蕴含着作者艺术构思的深刻用意。洪太尉是朝廷的钦差大臣，其身份代表着最高执政集团，他的行为品性又是刁滥恶吏高太尉的影射，而高俅则是水浒英雄被逼聚义的罪魁祸首，是封建统治集团罪恶行径的前台表演者。这样，“遇洪而开”的四字真书，非但不是什么“天数”，反而与正文中“逼上梁山”的情节主线，隐喻暗示地连接了起来。

第二个耐人寻味之处是，被洪信放走的一百单八个魔君，竟都是宋王朝奉为国教的道教所尊奉的星神——北斗星丛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既然如此，他们与祈禳消灾、保国安民的张天师本是同源一家的了。这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魔君的出世也像张天师一样，是为了“替天行道”，帮助赵宋王朝整治朝纲，保国安民，也就是第四十二回中，作者通过九天玄女之口所竭力宣扬的“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的忠义原则的体现。由此也可弄清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等故事情节，绝非如金圣叹所说，是古本《水浒传》所无，罗贯中“狗尾续貂”，而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一种无法消除的基因。从这也可看到《水浒传》思想倾向的复杂性、矛盾性。

因此，可以说，第一回绝非是游离正文之外、只为增加阅读兴趣而虚拟的文字，它与长篇《水浒传》所描绘的历史画卷的主旨，有着经脉相关的联系。通过它，预示着一场风雷激变将要在现时人间兴起。

气毬与高俅

第二回正文开始，作者一上来就描述了一部高俅的发迹史。这不仅揭了当朝太尉高俅的老底，而且也把他的后台靠山宋徽宗拉出来亮了相。

高俅原是个敲诈勒索、吃喝嫖赌的流氓，由于作恶太多，“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他被驱逐出境。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给他带来出头好运的竟会是一只小小的气毬。他因为一个“鸳鸯拐”而大受“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的端王的赏识，从此遭际端王，每

日跟随寸步不离。端王登基称帝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抬举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执掌朝廷军政大权。这正是“抬举高俅毬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通过这幅流氓升官图，我们看到的是封建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腐朽昏庸和生活上的骄奢淫逸。

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纵容下，高俅与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高俅在书中，是作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出现，作为梁山义军的镇压者进行活动的。他与梁山英雄的关系，体现了封建统治者与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和斗争。小说也正是这样来展开故事的：

高俅来而王进去。高俅殿帅府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滥施淫威迫害王进，以报当年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的私仇。王进是个忠孝两全的栋梁之材，本应尊之荣之，而高俅却挟仇施暴，逼使其离家外逃，完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高俅的第二桩劣迹是对林冲的坑陷。林冲与高俅毫无个人之间的恩仇瓜葛，导致高俅诬屈林冲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其子强占林冲之妻的淫欲。为了这无耻的一己私爱，高俅置朝廷王法于不顾，肆意逞凶，逼使林冲走投无路上梁山。

鲁智深在野猪林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林冲性命，惹了高太尉，再也不能在东京大相国寺存身了，只好上了二龙山。另一位英雄杨志，也因高俅的排斥打击而流落犯罪，落草二龙山。

这些情节开展的线索，说明“高俅发迹”乃是全书矛盾的发端。它概括地表现了水浒英雄活动的时代环境：皇帝昏昧，奸佞擅权，贤良遭斥，生民涂炭。它使我们看到，众多英雄的走上梁山，都是由以皇帝为后台、高俅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所造成，从而也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官逼民反”这个封建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客观真理。所以金圣叹的回评说：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乱自上作”，也就是说，正是封建统治阶级野蛮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掠夺，才促使这些身世不同、经历各异的四方豪杰，走上聚义造反的共同之路的，他们是被逼的，因而也是正义的。作者成功地写出了“逼上梁山”这一典型情节所由产生的典型环境。

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如果说高俅对王进、林冲的打击、坑害，体现的是封建高层统治集团野蛮专横的政治迫害，而林冲、杨志等的奋起反抗，也完全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表现了被动、分散、个体抗争的特点，那么小说第十四至第二十回这七回书的批判锋芒，就移向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层支柱——地方高级官僚，同时写出了反抗者小规模联合和主动进攻的特点。

梁中书荣膺北京留守的重任，靠的是什么？请看梁氏夫妻的一段对话：“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回答：“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一口招供，靠的是丈人蔡京的提携。

这里，通过对梁中书是蔡太师女婿这一裙带关系的叙写，从封建官僚用人唯亲的组织路线上，把地方与中央牢牢地联结了起来，同时也把经济掠夺与政治权势，两者互为依存的关系揭示了出来。

蔡京坐镇京师，而他诛求膏血的吸管却一直延伸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则依仗泰山权势，作威地方，肆无忌惮地榨取民脂民膏，每年赠送十万贯财宝给蔡京庆贺生辰。不难设想，年复一年的搜刮，将会使多少穷苦百姓倾家荡产，其间又隐含着多少贪赃枉法的罪孽恶行。王朝政治的腐朽，助长了地方贪酷的经济盘剥，真是上下勾结，沆瀣一气。这种腐败的时势，迫使人民揭竿而起，用特殊的方式手段，与剥削者展开反掠夺的斗争。那就是好汉们说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把贪官污吏从人民身上榨得的血汗抢夺回来还给人民，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正义行为。

我们看，从刘唐报信、晁盖赞许，到吴用说三阮撞筹、公孙道士找上门来，他们的认识和信念是那样的一致，行动充满热情，态度积极主动。尤其是打鱼为生的阮家三兄弟，长期的贫困生活非但没有使他们麻木畏缩安于命运，反而是热血奔涌，有着一股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和追求。他们对官府公然表示不满：“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而对“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强人生活，则早已心向往之。

反抗火种既早已埋藏于心，自然一点就会火焰熊熊。因此，对于吴用的邀约，他们的回答是如此的豪爽：“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于是七星

聚义，在黄泥冈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智取生辰纲”的活剧。“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劫夺生辰纲的行动，本来只是一场“损有余补不足”的经济斗争，但是，随着案发后梁中书、蔡太师的政治镇压和军事缉捕，冲突性质也就升格为反镇压、反围捕的政治、军事斗争了。晁盖等七人，在武力抗拒官军胜利后，主动上了梁山。七星聚义显示了被剥夺者初步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特点。

随着他们反上梁山，一座更有规模、纪律，目标明确——“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措施具体——“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的梁山水泊大寨，初步创建了起来。而一支规模不小、能与官军攻战的武装队伍，也随之组建而成。从此，揭开了梁山义军与朝廷官府对立、斗争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梁中书与蔡太师的这种封建官僚裙带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绝不是个别孤立的现象，而是极为普遍的存在。《水浒传》对这种腐朽风气的描写，是相当具体而又深刻的。

如：江州知府蔡得章就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蔡京看中江州“钱粮浩大”“人广物盈”，于是利用手中之权“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三十七回），贪酷的用意十分清楚。

又如：在青州任知府的竟是慕容贵妃的哥哥慕容彦达，此人更是“倚托妹妹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三十三回）

再如：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被安插在高唐州任知府，不但自己“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还纵容他的小舅子殷天锡横行害人。为强占柴皇城的花园住宅，他甚至扬言：“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五十二回）骄纵枉法，令人愤慨。

这种姻亲裙带关系，上下相串，左右勾连，盘根错节，枝蔓无穷。正如金圣叹所批：“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五十一回）普天之下没有宁宇，也就是人民造反天下大乱，这是腐朽统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

《水浒传》为我们绘制的这张封建统治的“天罗地网”是十分严密的。以皇帝为首、高俅等权奸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是网上的纲绳，而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赃官、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差拨吏役、狗腿爪牙，则是上下勾连、

纵横交织成的无数个网眼网目，它笼盖在广大人民的头上，使他们受尽了欺凌压迫也难以动弹挣脱。然而，随着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衰败，这张罪孽血腥的罗网，终于被神州各处风起云涌的人民抗争烈火，烧出了统治者永难补缀的无数窟窿。这种遍地满布造反火种的起义形势，在小说的七十回前，反映得极其昂扬充分、热烈感人。

梁山泊聚义基地初步创建后，《水浒传》作者的视线便撒向了大江南北更为广阔的社会。他择取了各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事例，通过纷繁复杂的情节铺展，对各路英雄汇聚梁山的壮伟行径，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化描叙，从而生动具体地勾绘出了梁山义军及其基地发展、壮大、巩固、成熟的形象过程。

这一过程显现出了以下的特点：英雄们以初建的梁山水寨为反抗的立脚基地和斗争胜利后的落脚归趋，或分散单干，或串联结合，用暴力武装的方式，对作恶多端的酷吏赃官地主土豪，给予无情打击，使封建王朝赖以统治的各级官僚机器出现故障断痕，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发生分化裂变。共同的斗争目标和理想产生了强大的吸附力和凝聚力，各处英雄好汉纷纷投奔梁山，梁山队伍就在抗官军打地主的激烈斗争中，迅速地发展壮大了起来。

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是值得注意的一回书。它是梁山基地形成后，第一次向封建王法所进行的大规模武力挑战。这次军事行动以梁山义军为主力，在江州众好汉的配合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劫法场的成功，不仅灭了统治者不可一世的威风，使梁山声名大振；令人更加振奋的是一大批义士的入伙，使梁山头领增加到四十位，像李逵、李俊、张顺等骨干都是在这次联合行动中上山的；特别是宋江的上山，使梁山获得了一个众望所归的出色领袖。因此，“劫法场”是梁山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次行动。而这一步，英雄们走的是那样的坚决果敢，表现出了“兀自要和大宋王朝作个对头”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晁盖等人上梁山“于法度饶不得”，那么这次行动“闹了两座州城，杀死许多官军人马”，朝廷惊动，犯下的该是弥天大罪了。因此，从“劫法场”开始，梁山义军与封建武装两军对垒、生死相搏的严峻局面已经形成，一场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农民革命战争实际也已开始了。李逵虽是粗鲁，却对这一形势有着阶级的直感，在庆功筵上提出了“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四

十回)的夺取政权的要求。

由于众英雄才刚上山，一切还未就绪，因而李逵的提议没有引起反响。但是，梁山义军的最终斗争方向和目标问题，在这一回书里已经是需要考虑的了。是杀去东京推翻赵宋王朝，还是仅仅局限于杀贪官惩恶吏？对此，《水浒传》的作者是毫不含糊的。他绝不赞同这支英雄队伍走上称王称霸的道路，因为那是“不忠不义”的。所以尽管在此之后，作者仍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梁山义军武装反抗斗争的巨大胜利，但用意却是在为义军受朝廷招安制造条件，把梁山的斗争纳入“忠义”的轨道，表现了作者思想中反封建民主因素与正统皇权观念的复杂矛盾。

从宋江上山到一百零八将大聚义，这之间东征西战、攻城略地，与政府官军、地主武装共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战争：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破高唐、青州、华州、大名、东昌、东平。祝家庄和“曾头市”都是坚固的地主豪强的武装堡垒，他们与梁山义军誓不两立。祝家庄前赫然飘着一对白旗，上书“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的联语。曾家五虎则高喊“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的口号。在这里，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对抗是多么严酷鲜明！祝氏父子、曾家五虎如此仇恨梁山义军，不就是因为梁山义军是一支无情打击地主恶势力、代表农民利益的武装力量吗？

要注意，作者并没有把这两座地主堡垒写成是纸糊的，而是充分刻画了他们的顽固、凶悍和强大，以至于艺高胆大的梁山英雄都无法轻易取胜，要“三打”“二攻”才解决问题。而祝家庄之所以在第三次能被攻破，却是依靠了另一股造反英雄的里应外合之功。

高明的作者在叙写攻打祝家庄的严酷、紧张、复杂斗争中，忙里偷闲，腾出笔来追插了一段“毛太公混赖解珍解宝老虎”的故事。登州城外的毛太公是个奸刁狠毒的地主形象。他不仅用计赖取了老虎，而且还勾结官府要斩草除根结果二解的性命。为救二解，顾大嫂、孙立等串联一起，杀了毛太公一家，造反上梁山。

这个插曲，在大故事中套小故事，使情节一波三折更加生动，尤为重要。正是由于毛太公之类地主老财的作恶多端，才导致了祝家庄的被攻破和梁山义军队伍的扩大。天下乌鸦一般黑，祝太公、毛太公、曾长者是一丘之貉；四海之内皆兄弟，受迫害者只有团结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这幅画卷所显示的生活真理。

梁山义军对高唐、青州、大名等城池的攻打，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王朝的基层官僚机制，给王朝统治造成了实际的威胁，“搅扰得道君皇帝龙盘椅上魂惊，月凤楼中胆裂”。反封建的政治意义也是很清楚的。

因此，这一个时期里，梁山英雄们虽然还没有形之于文、传之于口的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攻击方向，往往是救战友、惩恶官等一些外因的促使，无计划地去攻城略地，但这些战斗活动的实际效果和客观意义，却是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和地主阶级的经济盘剥，因而具有了农民战争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至于作者在叙写中流露出来的为义军受招安积累资本的主观创作意图，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梁山义军斗争意义的形象感受和理性认识。

“聚义厅”与“忠义堂”

人们都注意到了，晁盖曾头市中箭身亡，宋江做了山寨之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虽是个一带而过的细节，却意蕴很深，它预示着宋江今后要把这支造反队伍带向何方。所以李贽说：“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六十回评语）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那么宋江这一改名易帜措施的思想依据，在第四十二回中就已经露了端倪。这就是九天玄女娘娘下给宋江的法旨：“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并留下“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的天言，暗埋下第七十一回后“受招安”“征辽”“征方腊”等情节发展的喻示性伏笔。

宋江是《水浒传》中的核心人物，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九天玄女“替天行道”“全忠仗义”“辅国安民”的法旨，直接说出了作者创作《水浒传》的指导思想。那么，什么叫“替天行道”？

“天”即是君王、朝廷，作者认为它应是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保护者。“道”即是贤人在位的清明政治，作者认为它应是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本是圣君贤臣的职责。然而，由于天子昏庸、奸佞当朝，以至滥官恶吏横行，渔肉人民，迫使作者把“替天行道”的热望，寄托在宋江等梁山好汉身上。宋江等怎样来“替天行道”呢？也就是说，用什么方法、途径来实现这一政治奋斗目标呢？没有别的妙方，只有身体力行，坚持“忠义”二字。

“忠”是忠于君主，报效朝廷，这是最高理想，终极目的。“义”比较复